

後 記

從開始講述「一月革命」到現在告一段落，斷斷續續有快兩年的時間了。我所以斷斷續續花兩年的時間和精力講述「一月革命」的來龍去脈，一方面由於它是十年「文革」中一件影響深遠的重大事件，是自己親歷親見的重大事件，另一方面，我又曾經是一個史學工作者，所以它也應是我研究的對象，親自去研究和說明自己親歷的重大歷史事件。雖然有不少著述提到過它，許多人的回憶錄中講到過它，但還沒有一部專門的著作去講述他。記得曾經有人說過，對於文化大革命的問題宜粗不宜細。我想這是從追究政治責任的問題所講，如果過細的話，那很難辦。許多人既傷害過人，也是受害者，受過他人的傷害。如果從歷史研究的角度去研究和思考的話，那就應該過細。歷史需要具體而細緻的分析，決不是簡單的肯定或者否定二字所能了斷，那樣的話很難避免有絕對化的、片面的、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之嫌。故只有細緻而具體的分析，才能吸取其中有益的經驗和教訓。「文革」中那些事及其想法也不是一一切都錯，毛想解決黨員幹部和權力機構官僚主義脫離群眾的願望是很好的啊！「文革」中那些事件的主要當事人，現在有的已凋謝去世了，有的則不願再提它了。我自己年事也高了，趁現在腦子還清醒，記憶尚未完全模糊，就自己力所能及盡可能地把事情的來龍去脈說得清楚一些，為當事人立此存照。如張春橋，我曾經在他領導下工作十餘年，對他我還是忠心耿耿，他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在主觀上他是想忠誠於毛澤東思想，就我所知而言，

客觀地說，在有一些事的處理上他是對的，但在另一些事情的處理上，他也有因個人得失上考慮和因情緒化而處理不當的。如他在陳丕顯問題處理上，張春橋看到的僅僅是陳丕顯個人，他沒有看到陳在江西蘇區那段歷史，及其在新四軍那段歷史時期的社會關係中與譚震林、陳毅之間的關係。記得在「安亭事件」以後一段時間，他還說過那時他不知陳丕顯背後還有陶鑄和總理呢？言下之意，當時不該與陳丕顯如此決絕。由於在這個問題上，他處理過當，其消極影響之深遠難以估量，這不僅對他個人日後遭遇埋下伏筆，對此後整個「文革」運動的發展都有不利的影響。故許多事的處理，除了理想化之外，還有現實生活中各種複雜關係的考量。所以對任何人和事都不僅要因時因地客觀地作具體分析，而且要從長遠看必須適當地留有餘地，照顧到其方方面面相互關係中的利弊得失。在社會變革過程中，始終有應然與實然之間的矛盾，在處理過程中，它總有一個度，事情的成敗往往在這個度的掌控之上，過猶不及。我所以這樣做和這樣思考，是為了給後人研究這一段歷史提供一些線索，其中之是與非留給後人去評判吧！所以它既是我個人對往事的回憶，也不限於我親見親歷的記憶。整個事件的上下左右之間相互關係，所聞的，所傳聞的，以及相關的歷史記載，都要聯繫起來分析，它都是我研究和論證的對象。所以我自認為做這件事情還是有益的，對我來講也是一個難得的機遇。三五年以後，隨著年齡增長，那時即便想做也會心有餘而力不足的。

歷史著作，一般地講都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即都是為勝利者樹碑立傳的，成者為王敗者為寇是一種習慣性的思維方式。文化革命是一次失敗的群眾運動，「一月革命」也只能是一次失敗的歷史事件，那麼敘述這次事件的來龍去脈有意義嗎？有時候有理想的改革運動，由於主客觀條件的限制而失敗的教訓，往往對後人更有深遠的警示意義。我的老師陳

守實先生曾經在課堂上給我講述過一個思想，他說：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不僅有價值，還有價格呢，它的價格是隨著市場需求的變動而變動。我剛聽他如此說，當然感到非常奇特，怎麼能這樣講歷史呢？接著他舉王安石變法的例子。王安石變法是一次失敗的改革，在歷史上人們對它的評價往往時高時低。每當社會矛盾激化，變法的呼聲高漲時，對王安石及其變法的研究和評價往往亦會隨之而上升。他以清人蔡上翔的《王荊公年譜考略》一書為例，說明嘉慶年間，社會矛盾激化，所以關注起王安石的變法來。戊戌變法前後，王安石又一次時髦起來，梁啟超便曾就王安石變法寫過文章。為此他寫了一篇〈王荊公年譜考略跋〉，1960年代初發表在《文匯報》上。這個思想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許那時他已預想到中國社會會有變革的風暴來臨。從長遠看，一個歷史事件的歷史意義，不完全在於它即時的成功還是失敗，而它的社會歷史意義，則往往在於往後歷史發展的需要，如馬克思總結巴黎公社失敗教訓的《法蘭西內戰》便為我們作了示範的作用。1970年代林彪事件以後，文化大革命失敗的跡象顯露了，那時毛澤東關心起清代蔡上翔寫的《王荊公年譜考略》這本書來。我體會，毛的意圖是借這本書表示自己堅持「文革」思想路線的決心不變，所以我一方面讓上海人民出版社重印《王荊公年譜考略》這本書，同時又在《紅旗》雜誌上發表讀這本書心得體會的文章，強調王安石的三不足思想，即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撇開事件的成敗和是非，後人對歷史事件的研究和評價，確實是隨著時代的變化和評價者的需要而在不斷變化的。

領我踏入史學門檻的是我的老師陳守實先生，我為他主講的中國史學史和元明清史兩門課程擔任過輔導，後來我接替他這兩門基礎課，他去講中國土地制度史了。他看我寫的論文都是明清之際的，就陪我去見謝國楨，讓我拜他為

師，讀他的書。所以我對晚明的歷史多少知道一些。明亡以後，士人鑒於明亡的切膚之痛，紛紛著書立說，所以順治康熙年間，記載明亡痛史的著作很多，有親歷親見者的記述，有匯總時人記述的史著。這些著作，有的被清初張玉書、王鴻緒、張廷玉、萬斯同等人所主修的《明史》所吸收，大量的記述則散落在民間。至晚清，由於社會矛盾的激化，晚明的亡國痛史又重新為人們所注目。1905年，鄧實在上海主編《國粹學報》，重新刊載明末遺民的著作和圖片以激發人們反清的意識，後來出版的《國粹叢書》收錄了不少南明亡國之痛史。到1936年，日本侵華，民族危機深重時，明清之際的歷史又重新受到人們注目，神州國光社又一次結集出版內亂外禍叢書。該叢書前後有17輯，與晚明史相關的有九輯，主持其事的是鄧實、王靈皋、李季三人，蔡元培為之作序，提出「凡清代所指目為違礙之書，特為有志者所偏嗜」，所以書是禁不完的。明末四公子後來成了人們研究晚明史時關注的焦點，陳寅恪的《柳如是傳》，說到底還是藉以抒發前朝的情結，這一點人們不是看不懂，但還是被允許的。對於明亡的研究和思考，還是各有所好，郭沫若1944年3月在重慶《新華日報》發表〈甲申三百年祭〉。1644年3月18日闖王進京，這一年正好是甲申年，他在這篇文章中總結李自成所以失敗的原因，把同情傾向於參加農民軍的士人李岩身上。毛澤東在同年4月12日的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上作了題為〈學習與時局〉的講話，他在講話中說：「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們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他在11月21日給郭沫若的信中說：「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文獻看待，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那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倘能經過大手筆寫一篇太平軍經驗，會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議，恐怕

太累你。」那時抗日戰爭形勢已逐漸走向勝利，在那樣的條件下，總結歷史上革命失敗的教訓，對即將取得勝利者而言，仍然是非常有益的。講失敗的教訓畢竟是沉痛的，但給與人們的記憶往往是永志難忘，它比對勝利的陶醉要久遠的多。總結從李自成到太平軍的失敗，畢竟都是古人的，而毛在〈學習與時局〉那篇講話中，著重點還是在總結黨史上幾次失敗的教訓。言敗不是為了喪氣，而是為了振奮精神繼續奮鬥。而郭沫若的那篇〈甲申三百年祭〉的資料還是晚明史籍中來的，《明史》只有一篇〈流賊傳〉，簡單而且是一面之辭，他主要是根據計六奇的《明季北略》。計六奇是我的同鄉，無錫人，他在康熙十年（西元 1671 年）編輯了這部書，有 24 卷，講了明末各個集團治亂興亡的原因。如若沒有明末清初士人們親歷的記述和史家們的搜羅整理，郭沫若這篇〈甲申三百年祭〉也無從著墨了。毛在延安的時候曾經託人找《明季北略》來看。毛談這一類書時，他的思想感情始終站在弱勢群體這一邊。記得 1967 年 2 月 3 日，毛與阿爾巴尼亞的卡博和巴庫魯談話，這次談話的結束語他是這樣說的，他說：「秦始皇統治 16 年就倒了，有兩個人首先起義，一個叫陳勝，一個叫吳廣，他們都是那個時候的農奴。現在中國貼大字報的紅衛兵，在去年夏季被打擊（指資反路線——朱註）。被打成反革命的這些人，就是陳勝、吳廣。我們都是斯巴達克（古希臘奴隸起義的領袖——朱註），在社會上是沒有地位的，被看不起的小人物，受壓迫，組織共產黨。」這裡毛講的還是已經過去的歷史事件啊！所以歷史事件的價格和價值往往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作為重大事件的親歷者，多保留一些當時情景的紀錄，對於後代還是有用，什麼用、怎麼用，那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從認識發展史看，反面教訓在價值上並不比正面的經驗遜色，從證偽的角度講，反面的教訓甚至可以說比正面的經驗更有價值，更加

珍貴，因為它是人們付出沉重代價才獲得的教益。

從理念上講，文化革命的精神是從巴黎公社演化而來的。發表聶元梓的大字報時，毛讚揚她為新時代的北京公社宣言，此後，毛在中央文革小組的會議上，一再強調要發揚巴黎公社的精神。上海「一月革命」時，取名上海人民公社，也是由此而來，後來改名為革命委員會，是考慮到國體的連續性，並非毛要放棄巴黎公社的原則。不僅上海曾取名人民公社，黑龍江最早也叫人民公社，北京也考慮過叫北京公社，這反映了當時人們對理想主義的一種追求。巴黎公社實際上是巴黎人民在德軍進逼巴黎城下，巴黎市民被迫起來反對對外執行投降主義政策的國防政府的一次武裝起義。3月18日起義開始，5月間起義失敗，前後僅72天。領導這次起義的是布朗基主義者，傾向於馬克思的國際工人協會在公社委員中處於少數派的地位。起義失敗後的兩天，馬克思便撰寫《法蘭西內戰》，描述這次失敗的經過，總結這次失敗的教訓，同時出了一道難題，如何防止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僕變為社會主人。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巴黎公社提出了兩條正確的辦法：一是國家機關的工作人員由群眾自下而上選舉產生，而且選舉者隨時可以撤換他們；二是所有公職人員的工資，不論其職位的高低，只付給跟其他工人同樣的工資。這兩條也是毛澤東在1966年的下半年和1967年年初反復強調的。毛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初衷，他之所以支持上海的「一月革命」，只是企圖全國在實踐上破解這個難題。當然，這次文化革命和「一月革命」，如巴黎公社一樣，也失敗了，落得一個悲劇的結局。所以馬克思提出的這個難題，至今還留在世人面前，仍然沒有完全破解。

毛的初衷與他得到的結局是完全背離的。十月革命的勝利，中國革命的勝利，告訴我們一個革命的政黨可以依靠群眾取得奪取政權的勝利，從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以後，如

何保持革命的本色。奪取政權不是革命的終極目標，只是實現革命目標的一個手段。蘇聯的解體，告訴人們革命者取得政權以後還會失去它的，革命政黨在取得政權以後還是會蛻化變質的。文革運動是為了回答革命黨在奪取政權以後，如何保持革命的本色，如何防止黨的蛻化變質，如何防止各級領導幹部脫離群眾、蛻化變質為官僚特權階層，如何防止黨和國家變色的問題。政權、權力這個東西有兩重性，既能為革命所用，也是對革命隊伍的腐蝕劑，這個兩重性，在「文革」中新幹部身上也表現得很充分，這完全應了老子說過的一句話：「正復為奇，善復為妖。」（《老子》58章）「文革」儘管是一次失敗的嘗試，但它還是非常有價值的，在黨的建設、政權的建設、幹群關係的建設、黨的思想建設上，都有非常寶貴的教訓，搞運動的辦法能夠收效於一時，不可能持久，根本還在於黨的思想建設、制度建設、幹群關係的建設、國家制度的建設如何持之以恆，「文革」的歷史仍然是一部如何保證黨和國家不改變顏色的極有價值的歷史教材。記得在20世紀90年代中葉，我與金沖及個別談話時，我曾說過，如果沒有十年中蘇論戰，沒有十年「文革」，蘇聯東歐解體的狂潮來襲時，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這二塊招牌還守得住嗎？如果在中國也出現蘇聯解體那樣的局面，那今天中國的局面會是什麼樣呢？也許國家會四分五裂，人民再一次陷入苦難的深淵，中華民族再次陷入萬劫不復的災難之中。好在中國沒有讓赫魯曉夫和戈爾巴喬夫那樣的人掌握全局，為此，我曾寫了一篇〈釋鄉願〉的短文，受到劉再復之流的攻擊，但這個觀念我迄今仍堅持不改。

德國人尼采曾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叫〈悲劇的誕生〉。他認為希臘古典的悲劇是太陽神阿波羅和酒神狄厄尼索斯完美結合的產物，太陽神或者日神是理想的象徵，它把宇宙和人生當作一種夢境來把握；而酒神則是似醉似痴的狀態，

人們狂歌醉舞，實際上表現了痴狂的非理性狀態。把這兩種狀態完美地結合在一起，註定會是一個悲劇的結局。「一月革命」，推而廣之，整個文化大革命，也許就是人們處於這種畸形變態心理的表現。對待這樣的歷史悲劇，需要的是理解和尊重，而不是挖苦和嘲笑。

從操作層面上講，許多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質貫穿於「文革」。其中既有《西遊記》中孫悟空那種大鬧天宮的遊戲格局，又有帝王駕馭群雄的種種方術。文化革命，自以為史無前例的創造，在形式上卻處處擺脫不了傳統文化的印跡。過了當時那種似痴似醉、狂歌亂舞的狀態，冷靜地回過頭來看看，又覺得怎麼會那麼滑稽可笑，再想一下那時自己的心態，卻又是那麼虔誠而真心！從個人來講，我們都為它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對此，我卻無怨無悔，因為我經歷了這樣的跌宕起伏。歷史由傳統奔向現代的潮流就是如此不斷地迴旋而又滾滾向前的，再去追究那時領袖們的責任已經完全多餘了，他們都早已作古了。需要的是，弄清楚它背後那麼多的為什麼。這樣才能理解它，才能吸取有益於後人的教訓，才能挖掘出其中寶貴的精神財富。中國歷史上所有的亂世和失敗，對當時的人們而言，從微觀上講都是深重的災難，從宏觀上講，在那些領袖人物中間卻又有許多曲折委婉、悲壯淒涼的故事，特別那許多英雄如何走上末路、走上霸王別姬的壯烈故事，它們都是值得後人不斷去回味的珍貴教材啊！